

高校产业兼职教师管理可“花小钱办大事”

■ 顾德仁

近年来,随着产业界对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以及高校与产业界互动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产业界人士进入高校,成为校园里的兼职教师。

对此,有关部门显然已经注意到其背后缺少制度化规范的弊端。不久前,教育部、中央组织部、科技部等八部门印发《普通本科高校产业兼职教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成为我国在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聚焦普通本科高校产业兼职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门文件。

该文件的出台对于我国普通本科高校产业兼职教师队伍的建设无疑是重大利好,但在具体实施层面,如何将文件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我们做更多思考。

前期经验仍可借鉴

尽管《办法》的出台具有开创性意义,但从历史上看,无论我国针对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职业院校兼职教师管理,还是各地方针对普通本科高校的产业兼职教师管理,都已经出台了相关办法。

比如早在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委就联合下发《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其适用范围包括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在此基础上,2023年,四部委联合发布修订后的《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并特别强调了该办法的适用范围包括本科层次的职业学校。

地方层面,以我所在的江苏省为例,早在2010年,江苏省便专门发文,提出从省内企业选聘一批科技型企业企业家,到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普通高校担任产业教授,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办法;后来受益面扩大至本科生。2017年,相关政策又开始向高职层面扩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办法》的出台是建立在前期多年相关实践经验基础上的,这一点从政策的文本中有所体现。

比如,在修订后的《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中提到,聘请的兼职教师应以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为主,但根据需要也可聘请相关领域的能工巧匠;《办法》中也强调,鼓励聘请相关行业具有一定声誉和造诣的能工巧匠作为兼职教师,甚至可以为此适当放宽学历、职称等要求。

不过在我看来,目前出台的《办法》所规定的内容仍属于框架性,有些细节性内容仍可以从前期文件中加以借鉴。

比如,《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特别提到在聘请产业兼职教师时,高校可采取个体聘请、团体聘请或个体与团体相结合的方式,这意味着职业院校可以同时聘请一个团队。这种方式既有利于激发团队带头人参与教学的热情,也有利于后期在带头人因偶发原因无力兼顾日常教学



高校对于产业兼职教师的“管理”,绝不能仅停留在“提要求、定任务”层面,而是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给予后者足够的尊重,并想方设法激发其对学校、对教学的荣誉感与归属感。

时,正常教学活动的持续。同时,团队带头人在选择成员时,往往偏向于参与教学意愿强烈的年轻人,这有利于更多产业界有进取心的“新人”进入职业学校。类似政策如果可以被纳入《办法》中,显然更有利于本科高校产业兼职教师的选聘。

类似内容还包括《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提到的“鼓励职业学校与企事业单位互聘兼职”。事实上,职业学校教师中,能让企业付费聘请的有价值的贡献者并不多。但在普通本科院校中,在科研攻关、课题研究领域出现高水平教师的概率要更大。从这个角度而言,该政策对于普通本科院校更为适用。

关于产业兼职教师的误解

通常观念中,高校聘请产业兼职教师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是带领学生进行产业实践,将相关产业实践经验传授给学生。这当然是产业兼职教师的重要职责,但这是否是产业兼职教师对于高校的唯一价值?

此次发布的《办法》对产业兼职教师承担的任务进行了明确划分,其中提到产业兼职教师要深度参与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设计、教学资源开发等。在我看来,课程教学中,产业兼职教师的工作并不仅限于“实践”层面。

究其原因,由于这些人长期处于产业前沿,对于产业领域相关理论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前沿的“理论课”上,他们更能够天然地将理论与实际进行深度融合。这对于占据我国普通本科院校“半壁江山”的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而言,更具有针对性。但遗憾的是,很多人陷入“产业教师只能指导实践”的误区,很难看到这一点。

针对产业兼职教师的误解并不限于此。

比如,很多高校之所以不愿意真正投入精力引入产业兼职教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产业兼职教师难以管理,也很难产出教学成果。但至少在我看来,相较于校内专职教师,用心聘请的兼职教师更容易管理,

更有战斗力,也更容易产出教学成果。

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首先源于我曾在苏州市职业大学担任电梯学院创院院长期间的实践。当时,我聘请了十几名产业兼职教师参与日常教学,有些课程的教学任务甚至直接由多名企业高管以教学团队形式承担。结果发现,相较于某些校内专任教师,他们在课堂的真实投入更多、上课态度更认真,对我所提要求的完成度也更高。

有人或许认为产业兼职教师工作忙,很难抽出精力投入教学。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聘请产业兼职教师的目的在于“凑数”“充面子”,而是在与当事人以及企业进行深入沟通后,以具有足够实力以及从教意愿的产业界人士为聘请对象,此类人士在承担繁忙工作的同时,既然能答应到学校上课,其理想和情怀便已在事实上经过了一轮极其重要的“筛选”。

加之相较于市场化薪酬,公办高校开出的这节课最多百余元的课酬,很难打动这类往往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产业界人士,在此情况下,如果他们依然能欣然进入高校从教,就可以佐证其奉献精神。高校对于此类人的管理成本以及管理难度更低。毕竟他们是真正有教育追求的一群人,只要是有益于学生成长和职业发展的措施和要求,他们往往更乐于遵守和执行。

高校管理不能仅“提要求”

即便我们走出传统误区,将合格的产业兼职教师聘入校内;即便产业兼职教师的管理成本并不及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但“管理”问题依然是我们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高校对于兼职产业教师的管理包括通常意义上的“管理”,即前者提出管理要求,督促后者认真执行。但“管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助力兼职产业教师的职业成长,以及提升其“教师”身份的认同。

诚然,受拨款机制等因素限制,高校很难在课酬方面达到产业兼职教师的市场平均水

平,但高校有着天然的资源优势,比如图书馆资源、互联网的特定数据库资源,乃至校内各种体育设施资源等,这些资源的固定成本高校已经支付,如果可以向产业兼职教师开放,增加的额外成本几乎可以忽略。这种“顺水人情”能有效提升产业兼职教师的归属感、成就感和荣誉感,也有利于其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

在这方面,高校可花心思琢磨“花小钱办大事”。早在多年前,有高校便已经做了很好的探索。

比如,某所坐落于苏州工业园区的高职院校,鉴于园区内外企资源集聚,便由校领导出面,邀请部分外企高管担任学校兼职导师。显然,相对于动辄数百万元的外企高管年薪,这所高职院校难以匹配足够的授课费用。但该校另辟蹊径,每年仅发给这些高管每人1美元报酬。不过,他们会将这1美元用心装饰,做成精美的卡片,放到漂亮的画框中,并通过举行简约又不失隆重的仪式,邀请高管到场,郑重地将这1美元送出,将其誉为“一美元教授”。

此举的效果堪称“两全其美”——高校几乎不用花费什么成本,便解决了高质量产业教师缺乏的问题;“不差钱”的外企高管虽未得到市场价值的金钱回报,但感受到了学校的尊重与荣誉感,而这才是他们更为看重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花小钱办大事”的实例。

在高校中,类似的做法还有很多。比如,很多高校的体育场馆使用率并不饱和,因此,是否可以允许产业兼职教师免费使用校内体育设施,甚至鼓励其自带的家属或好友到操场或游泳馆锻炼。对于高校而言,增加的管理成本微乎其微,却能使产业兼职教师产生很强的归属感。

此外,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必然是一位优秀的教练,其职业发展有着内在相通之处。高校需要有意地聘请处于职业上升期、精力旺盛的年轻产业兼职教师,后者也需要接受相关的职业培训。而高校内部也有很多针对专任教师的内训课程,我们是否可以以产业兼职教师提供一些内训名额?比如,某些教学方法的内训,同样适合需要培训下属的企业管理人员。

总之,高校对于产业兼职教师的“管理”,绝不能仅停留在“提要求、定任务”层面,而是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给予后者足够尊重,并想方设法激发其对学校、对教学的荣誉感与归属感。正如前文所言,能够欣然接受高校邀请的产业界人士,往往具有一定的理想和情怀,高校需要做的只是将这种情怀“用心”挖掘并加以放大。能做到这点,所谓“管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作者系常熟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智能电梯产业学院)正高级工程师、苏州远志科技产业学院创始人,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斯坦福大学：跨学科人才培养，不必总盯着专设跨学科院系

■ 张晓报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对于跨学科人才需求的日益强烈,高校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着转型挑战。在此过程中,作为跨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高校必须建立健全与新培养模式相适应的组织体系。这是目前国内高校必须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在这方面,国外很多顶尖高校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中,便表现出多元组织形式协同支撑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特点,这种做法超越了创建跨学科专门组织的思路,值得我国高校借鉴。

设置综合性的学科体系

作为大学组织的基本构成单元,学科是高校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职能的基本载体。跨学科人才培养是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或领域的人才培养形态,多学科是其重要基础和前提。在斯坦福大学校方看来,多样性是一所大学的必要特征。正如其教务长珍妮·马丁内斯在关于多样性和包容性的说明中所言,“多样性对我们的研究和教育使命至关重要……为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了实现科学的下一个突破,或者为了达到艺术表现的新高度,我们必须带来广泛的想法和方法”。

作为综合性大学,斯坦福大学设有商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文理学院、医学院和可持续发展学院等7个学院。其学院虽然不多,但学科覆盖面极广,涵盖了除军事学外几乎所有学科专业,是典型的专业设置全面的综合型大学。该校不仅学科建制完善,学科建设质量也首屈一指。根据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WU)2023年的数据,斯坦福大学全球排名第二,而且有26个学科位居世界学科前十。

该校全面、优质的学科为整合和利用多个不同学科和院系的资源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广泛而深入的学术项目就是由以上7个学院综合提供的。而这7个学院又在同一个校园内,

为学生追求自身的志趣,并合作解决复杂的全球问题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同时,物理上的毗邻也自然而然促进了多学科的合作。

强化单个学院的综合性

在斯坦福大学,除了院系间,单个学院内部亦可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独立实施跨学科人才培养。此时,学院自身的综合性就格外重要——如果内部学科结构过于单一、学科面狭窄,就会因为同质性过强而无法给予学生异质性的教育体验。在这方面,斯坦福大学不仅从总体层面表现出多学科特征,其单个学院也表现出一定的跨学科特性。

如前文所述,斯坦福大学目前共有7个学院,这些学院中很多虽然不是跨学科院系,但表现出了一定的学科广度。比如,文理学院是斯坦福大学博雅教育的基础,该学院包括23个系和25个跨学科项目。该学院同时也是学校基础研究的家园,师生在这里可以跨越学科进行自由、开放与批判的探究。

如果说文理学院一般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内部最大学院,其综合性并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那么其他专业学院的综合性更能说明问题。比如,作为斯坦福大学7个学院之一,教育学院的教师来源于社会科学、技术以及教育等多个学科,这使其在研究和教学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种独创的“大学院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院过多造成的“离心力”,以及条块分割过细造成的界限与壁垒,为“大学院”内部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建立跨学科组织,以及实施跨学科人才培养奠定了多学科基础,保证学生即使身处一个学院,也能实现一定的广度学习。

创设跨学科学院

斯坦福大学尽管学院数量少且稳定,但也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创设了一些新学院。

众所周知,可持续发展是目前全球面临的

最重大挑战之一。为超越传统学科方式,回应当今全球面临的紧迫挑战与复杂问题,斯坦福大学于2022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学院,这是该校75年来成立的第一所新学院。

不同于其他学院,可持续发展学院是一所典型的跨学科院系。为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紧迫性和复杂性,该院汇集了分析和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所需的所有学术领域,包括土木与环境工程、地球与行星科学、地球系统科学、能源科学与环境、环境社会科学、地球物理学和海洋学等,这使其能以跨学科、多学科的方式,共同创造解决方案。

此外,相比于学科结构单一的学院,跨学科院系的学科构成往往更多元。因此,在组织多学科资源、实施跨学科人才培养上更为便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学科与院系面临的条件限制,为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更充分的实践空间。

目前,斯坦福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学院设有“地球系统”“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发展项目领导力变革”等专门的跨学科项目。为使学生在学科交叉过程中产生新见解,这些项目所提供的教育具有基础广泛的特点,师生工作也具有超越单一传统学科的特性。以“环境与资源”跨学科项目为例,该项目跨越自然科学、工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法律和政策、医学和商业等多个学科或领域,这不仅是应对全球重大环境和资源可持续性挑战所需,也为培养学生解决复杂环境和资源问题所应具备的多元知识、技能、观念和思维方式创造了机会。

建立跨学科研究机构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机构由院系实验室、大学与工业合作的研究中心、政府设在大学的研究中心,以及独立研究机构四种类型组成。其中,独立研究机构是指来自多个学院的教师组成的正式研究机构,其工作直接向负责研究的副校长汇报。这类机构由学校直接管理,虽与校内其他机构有一定的合作

和联系,但不受学院、学系的行政和学术文化的控制与束缚。

目前,斯坦福大学共有15个独立的实验室和智力交叉的平台。一方面,这些跨学科研究机构通过开设跨学科课程、设置跨学科专业等途径参与跨学科人才培养。对于独立建制的跨学科项目而言,研究虽然是其主业,但作为研究型大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也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整所大学的培养。比如,该校的跨学科生物科学研究所(Bio-X)就为学生开设了“跨学科生物科学前沿”系列主题课程。

另一方面,这些机构也利用自身研究优势,通过向学生提供跨学科研究机会的方式参与人才培养。

长期以来,斯坦福大学一直致力于打造具有研究型大学特色的本科教育模式,鼓励学生参与研究训练并为其创造机会。因此,尽管这些独立研究机构的研究项目一般以教师、科研专员和研究生为主体,但并没有限制本科生参与。相反,大多数研究机构都将培养本科生作为一项重要使命,这也使这些本科生能和教师、研究生一起,广泛参与从国际与经济研究到环境、能源与健康研究等领域的协作研究。

总之,斯坦福大学在跨学科人才培养上表现出多种组织形式共同支撑的特征。这些组织形式共同为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平台和载体。这些经验对我国高校最重要的启示在于,不能单独从设立专门的跨学科院系与研究机构着手,而是要同时发挥现有学科组织的力量,促进它们的跨学科协同育人。此外,还要对现有学科结构单一的学科组织进行一定的跨学科改造,不断丰富其跨学科内涵,从而提升其跨学科人才培养能力。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课程资源跨学科共享机制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HNJG-2021-0660)阶段性成果)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以下简称考研国家线)。数据显示,今年几乎所有专业的考研国家线都呈下降趋势,幅度在10分左右,该现象引发很多人关注。甚至有人猜测,这是否意味着考研竞争的激烈程度变小了。

在笔者看来,该现象出现的机理比较清晰——根据我国的研究研究生招生计划管理制度,考研国家线是一种宏观调控工具。如果国家有意扩招,在考试难度不变且报考人数不变的情况下,考研国家线自然会下降。如果报考人数下降,考试难度上升,考研国家线的下降幅度还会更大,今年的情况正是受这些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首先,研究生扩招是必然趋势。2024年,全国新增了约2000个硕士学位点。这些学位点大多是国家力图扩大招生的专业学位点。

其次,研究生报考人数在过去两年明显下降,从2023年峰值的474万降至2025年的388万,其中还包括未知比例的弃考生。大幅下降的报考人数减少了招生蓄水池的容量。

再次,考试难度由试题本身难度和考生整体水平决定。由于缺乏相关研究,试题难度的影响难以衡量,但考研群体包含越来越多的“二战+”群体。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开展的调查显示,该群体占在读硕士生的近1/4,且相对于首次成功“上岸”的考研生来说,“二战+”群体的学业能力稍弱,因此大致可以认为考试难度在增加。

最后,研究生招生可分为统考招生和推免招生两类。推免招生的总体比例近年来保持大致稳定。我们于2021年和2024年开展的两轮调查发现,推免生在全日制在读硕士生中的占比大致为16%。且由于推免生大多聚集于原“985工程”高校,但新增硕士点大多不在此类高校,因此推免招生占比对统考招生扩招的总量影响较为有限。受上述因素综合影响,考研国家线的下降就成为必然现象。

不过,该现象能引发大量关注,也反映了当前国家统考科目考试的范围在扩大。考研国家线仅涉及国家统考科目,如果统考科目更少,更多是单位自命题,国家线的重要性就没那么突出。

考研国家线下降的现象仅涉及研究生招生,相对于此现象,笔者更关注的是其反映的研究生教育大众化趋势。根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马永红等学者的看法,在学研本比在精英化阶段低于15%,在大众化阶段介于15%~50%。研究生不断扩招必然会推动研究生教育的大众化。根据前述标准,我国一些发达地区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

该阶段研究生教育的定位、教育方式以及学生的教育选择与精英化阶段有较大差异,更多仅就硕士研究生教育展开讨论。

首先,大众化阶段的硕士学位在绝大多数情形中是终结性学位,也是不需要产生原创性知识创新就能获取的学位。因此,该阶段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定位应是高层次的专业教育,是为职业和工作岗位做准备的教育。满足职业工作岗位所需的人才规格和素质要求是硕士学位点设立及发展的“第一性原理”。我国大力发展硕士学位点便很好顺应了这一趋势。

不过,很多研究生培养单位没有对此做好准备。比如,硕士研究生绝大多数都要进入企业工作,但很多专业学位点根本就没有做好企业人才培养的需求调研,在完全不了解企业招聘要求的情况下仓促上马建设,导致毕业生难以“适销对路”。

其次,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方式及其背后的制度也需要作出调整。例如,本研一体化培养应有较大范围的突破。当我们观察欧洲的研究生教育时,会发现德法等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本研一体化培养,只是“博洛尼亚进程”后,才将原有的学制分解为本科和硕士,但培养模式和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当前,我国的本研一体化培养仅限于极少数高校和学科专业,是一种吸引优秀学生的特殊政策优惠。本科生的招生培养和硕士生招生培养条块分割,两者的衔接和贯通程度不足。大量学生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考研、保研的无谓竞争中。如果本研一体化培养的教育方式和制度能有较大范围的突破,课程教学、科研训练、专业实践、学位论文等就能很好地统筹起来。研究型大学读研比例非常高的部分院系学科,应该主动实施这样的改革。

最后,大众化阶段学生的研究生教育选择应更加理性。理论上说,研究生已经成年,读研期间应有比较明确的学业和职业规划。但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有的学生完全不知道如何读研究生,甚至有的本科“学霸”在研究生期间也会陷入迷茫状态。学生需认识到,读研有很大沉没成本和风险的,读研并非读“大五”“大六”。大学应在学生就读本科阶段时,就提供更高质量的学业深造与职业规划服务,而部分高校却将提高考研率作为事实上的“目标”去追求,本科教育亦成了考研预备和培训教育,“学为中心”被异化,这显然违背了高等教育本身的使命。

考研国家线下降背后... 研究生教育正在大众化